

第一章

重新重視研究中國共產黨

2007 年 10 月 15 至 21 日，中國共產黨召開了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大會召開之前的 2007 年 9 月 11 日，毛澤東的政治秘書李銳撰寫了一封給胡錦濤總書記的公開信。這封信的標題是《關於黨本身改革的幾點建議》。^[1]在這封信裏，李銳列舉了一系列的觀點，並表明了為什麼黨自身的改革應當成為中共領導層的頭等關切。這些觀點圍繞着民主這一主題有組織地展開。

李銳首先引用了陳獨秀一些有關民主的強而有力的論斷。陳獨秀是中共的創始人之一，他曾在 1919 年的「五四運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就在他去世之前的 1942 年，陳獨秀批評了斯大林（Joseph Stalin，或譯史太林）在蘇聯的專制獨裁，並為民主大聲疾呼。他說：

最淺薄的見解，莫如把民主主義看作是資產階級的專利品。如果有人反對或鄙薄資本主義社會的民主，這不是馬克思主義，而是法西斯主義；這不是反對資產階級，而是幫助資產階級更凶橫地、更露骨地迫害無產階級。民主不是哪一個階級的概念，而是人類幾百年鬥爭才實現的。^[2]

在信中，李銳還詳盡地闡述了毛澤東的個人專斷如何導致、以及為什麼導致了中國無窮盡的政治災難，這些災難包括反右運動（1957–1958），大躍進（1958–1960）和文化大革命（1966–1976）。在李銳看來，要阻止這樣的災難再次發生，中國共產黨應當致力於政治改革。此外，中國共產黨自身的改革是中國當前所有改革成敗的關鍵，是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中心環節。那麼，如何致力於黨自身的改革呢？李銳提到，1989 年他在哈佛大學參加一個學術會議時，聽到一些西方學者稱中國為「黨國」（Party-state），因此他提出，黨改革的目標應當是憲政主義，即黨自身應當服從於國家，而非相反。正如李銳在 2002 年中共十六大前所做的那樣，他建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應當制定《政黨法》，使黨能夠在法律的範圍內活動。

1. 李銳：《關於黨本身改革的幾點建議》，參見：http://www.yzzk.com/cfm/Content_Archive.cfm?Channel=ae&Path=223847801/40ae4a.cfm（最後瀏覽時間：2009 年 8 月 4 日）。

2. 引自李銳：《關於黨本身改革的幾點建議》，同上註。

在中國，李銳並不是唯一一個認為黨需要進行改革的人。近些年來，中國有越來越多像李銳一樣的人開始呼籲，黨自身要進行改革。2007年3月，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之前，中國人民大學的前副校長謝韜發表了一篇題為〈只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的文章。這篇文章發表在自由派雜誌《炎黃春秋》上，這本雜誌在黨內外的自由派中廣為流傳。^[3]在這篇文章裏，謝韜提出了一系列關於黨自身改革的類似建議。謝韜提到：「孫中山創立民國，有了憲法，有了國會，但蔣介石強調一個黨，一個領袖，（國民）黨在憲法國會之上，領袖在黨之上，還是專制獨裁。」^[4]

謝韜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他的入黨介紹人張友漁在彌留之際曾對他說：「抗戰（1937–1945）勝利後，我們目睹國民黨專制獨裁貪污腐敗，最終盡失人心丟掉政權。我們這些老同志無論如何不能眼睜睜地看着我們（中國共產）黨也走上這樣一條路。」根據謝韜文章裏的觀點，黨的領導應當拋棄傳統的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而應學習歐洲的社會主義模式，也就是民主社會主義。他提出只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5]

李銳和謝韜都是曾在中共黨內擔任過重要職位的人，他們都生活在中國。當他們察覺到自己的意見可以產生政治影響力時，亦即他們認為自身的觀點將會在中國社會的黨內外自由派中產生共鳴時，他們就表達出自己的觀點。他們也預測到自己將會受到黨內保守勢力和社會中所謂「左派」人士的強烈回應。

儘管圍繞着李銳和謝韜的觀點有許多爭論，但是無論是黨內的自由派還是保守派，都逐漸認識到一個問題，即對黨的領導層來說，中共自身的改革是一個迫切的議程。他們之間的區別在於黨應當朝什麼方向進行改革。過去這些年來，中國共產黨正在加速失去

3. 謝韜：〈只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炎黃春秋》2007年第2期。參見：<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00318>（最後瀏覽時間：2007年11月2日）

4. 同上註。

5. 同上註。張友漁（1899–1992），中國著名的法學家和國際問題專家之一。20世紀80年代，他在促進中國的法制改革上起了重要的作用。

自身的認同，在黨內如此，在社會群體中也是如此。胡錦濤在十七大上所做的報告中就承認：「對改革發展穩定一些重大實際問題的調查研究不夠深入。」^[6] 黨的認同的削弱是一個長期的問題。胡錦濤指出：

我們（中國共產）黨不斷探索和回答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建設什麼樣的黨、怎樣建設黨，實現什麼樣的發展、怎樣發展等重大理論和實際問題，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堅持並豐富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基本綱領、基本經驗。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大地上煥發出勃勃生機，給人民帶來更多福祉，使中華民族大踏步趕上時代前進潮流、迎來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7]

以上的討論有多種作用。李銳和謝韜都提出了至少兩個有關中國共產黨的重要問題。第一個問題是：「中國共產黨是什麼？」這個顯而易見的問題卻沒有顯而易見的答案。正如胡錦濤在十七大報告中所指出的那樣，中國要建設什麼樣的黨？如何建設？這是一個開放式問題。當中就存在了一個黨對自身進行定位的問題。黨如何定位自身？中國的社會群體怎麼定位黨？這些都是有待回答且具有重要政治意義的問題。李銳表達了他對中國「黨國體制」的不滿，並且堅持應當制定一部規範政黨的法律。他認為黨應當成為國家機構的一部分。換句話說，中國共產黨至今還不是國家機構的一部分，而是超越於所有國家機構之上。第二個問題是：「中國共產黨正在朝什麼方向發展？」最近，不同社會群體（即自由派和新左派）有關中國共產黨的爭論，正是出於中共正處於轉型階段這一事實。改革開放以來，儘管中共自身的威權主義結構依舊不變，但是黨已經發生了劇烈的變化。由於中共是中國唯一的執政力量，黨的任何重大變化都會影響到政治權力在不同的政治群體和社會群體之間的重新分配。相比其他群體而言，一些群體將會受益更多。同樣地，

6. 胡錦濤：《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2007年10月15日，英文版。北京：新華社，第5頁。

7. 同上註。第8頁。

一些群體也許會成為這種變化的受害者。因此可以理解，不同的群體都會提出他們所認為的中共的理想模式。謝韜關於中共應當採取民主社會主義模式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的。

此外，這兩個問題對學術界也有重要的意義。正如本書之後將會論述的，近幾十年來，關於中國共產黨的研究正在逐漸淡化。現在，隨着黨的改革成為中國社會日益重視的一個議題，是時候重新重視研究中國共產黨了。因此，以上的論述旨在提醒學術界：要回答以上這些重要問題，我們還遠遠沒有準備好。

本書的目的，就是要回答這兩個關於中國共產黨的關鍵問題。第一個問題是：「什麼是中國共產黨？」要回答這個問題，本書將採用埃米爾·塗爾幹（Emile Durkheim）的研究方法，即研究「作為事實的社會現實」（social facts as things）。^[8] 本書將試圖提出一種文化理論，來解釋作為一個事實和一個社會現實的中國共產黨。要回答第二個問題，本書將檢視中國共產黨是如何運作的，並且探討它為什麼這樣運作。本書不回答中國共產黨應當走向何方。換句話說，這個問題將從實證意義的角度來回答，而不是從一個規範意義的角度來回答。

在本章接下來的部分裏，筆者會首先討論為什麼中國共產黨依然重要，然後檢視已有政黨文獻與中國共產黨有何種相關性。在解釋為什麼有關中國共產黨的學術研究淡化了的同時，這一討論也將為下一章提供一些知識背景。在下一章裏，筆者將建立一個分析框架，從文化的角度來解釋中國共產黨。

8. Emile Durkheim, *The 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 8th edition, trans. Sarah A. Solovay and John M. Mueller, ed. George E. G. Catli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38, 1964 edition), p.14.

1. 中國共產黨很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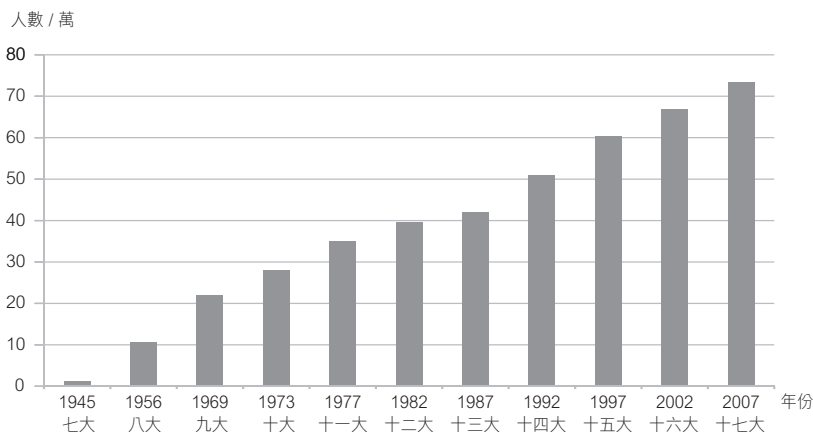
在當今世界，沒有任何一個政治組織能夠像中國共產黨一樣，在國際和國內都擁有如此巨大的影響力。中國共產黨是世界上最大的政黨。2008 年，它的成員總數就達到了 7,300 萬之多，^[9] 比法國和伊朗各自的人口還要多（法國是歐盟中第二人口大國，擁有 6,400 萬人口，而伊朗有 7,100 萬人口）。中國共產黨還治理着中國這個世界上最大的國家，其人口多達 13 億以上。

自從 20 世紀 70 年代末鄧小平實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經濟成就，經濟總量以年均 10% 左右的速度增長。就國內生產總值（GDP）而言，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第四大經濟體，僅次於美國、日本和德國之後。^[10] 此外，中國經濟屬出口導向型經濟，深入地融入了世界體系。無論中國國內發生了什麼事，都會產生深遠而相應的外部影響。中國共產黨作為中國唯一的執政黨，在過去 30 年所發起的所有重大改革中，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此，快速的社會經濟轉型所帶來的一切後果，中共是唯一可以承擔的政治角色。

中國共產黨於 1921 年在上海成立，在過去的一個世紀裏，它已經歷了滄桑巨變。1921 年，中共是一個僅有 53 名黨員的小黨，20 世紀 20 年代和 30 年代，它經歷了國民黨的政治攻擊，但卻頑強地生存下來，並在隨後的幾十年裏大幅度擴張。在革命領袖毛澤東的領導下，中共在 1949 年成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執政黨。1949 年後，中共還在毛澤東的「繼續革命」中生存了下來，這些「繼續革命」包括了「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在鄧小平掌權之後，中國共產黨開始在中國進行空前的社會經濟轉型。

9. 譯者註：據中共中央組織部最新黨內統計數據顯示，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中國共產黨黨員總數為 8,944.7 萬名。參見：《中共中央組織部：2016 年中國共產黨黨內統計公報》（2017 年 6 月 30 日），人民網：<http://cpc.people.com.cn/n1/2017/0630/c64387-29375750.html>

10. 譯者註：2010 年，中國已經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參見：《中國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2011 年 02 月 14 日），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1-02/14/c_121074485.htm

圖 1.1 中國共產黨黨員人數（1945–2007）^[11]

資料來源：根據中共中央組織部的數據，由作者自行彙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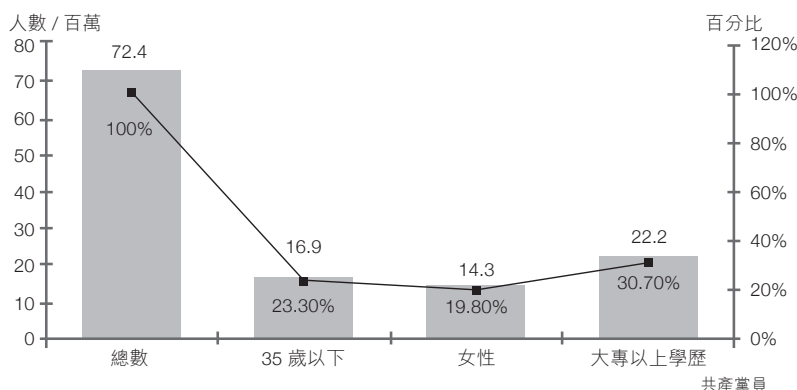
在過去的 30 年裏，中國共產黨經歷了更為劇烈的變化。黨吸收了 1,200 萬名新黨員，以每年 240 萬人的速度在增加（見圖 1.1）。到 2006 年底，中國共產黨擁有 360 萬個黨組織，它們包括了黨的委員會和基層黨組織。超過 42 萬個企業已經建立了黨組織。在 240 萬個非國營部門的企業中，17.8 萬個（佔 7.4%）已經建立了黨組織。^[12] 換句話說，黨組織已經深入到所有類型的企業、機構和社會組織當中去了。

儘管中共依然保持着高度威權主義的結構，但它的人員構成已經發生了變化（見圖 1.2）。新發展的黨員通常更年輕，受過更好的

11. 譯者注：2012 年底，即十八大召開當年，黨員人數為 8,512.7 萬名；2016 年底，即十九大召開前一年，黨員人數為 8,944.7 萬名。

12. 據中共中央組織部最新黨內統計數據顯示，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中國共產黨現有基層組織 451.8 萬個，其中基層黨委 22 萬個，總支部 27.7 萬個，支部 402.1 萬個。全國 18.9 萬個公有制企業已建立黨組織，佔公有制企業總數的 91.3%。185.5 萬個非公有制企業已建立黨組織，佔非公有制企業總數的 67.9%。參見：《中共中央組織部：2016 年中國共產黨黨內統計公報》（2017 年 06 月 30 日），人民網：<http://cpc.people.com.cn/n1/2017/0630/c64387-29375750.html>

圖 1.2 中國共產黨黨員的組成 (2006)^[14]



資料來源：根據中共中央組織部的數據，由作者自行彙編。

教育。到 2006 年底，30 歲以下的黨員達到了 169 萬，佔黨員總數的 23.3%；接受過大專及以上教育的黨員合計有 222 萬人，大約佔黨員總數的 30.7%；女性黨員人數總計 143 萬，大約佔總數的 19.8%。^[13]

從政策層面來看，不僅對中國而言，即使是對世界來說，中國共產黨也正變得日益重要。隨着中國經濟的快速崛起，中國在世界政治舞台上也扮演着重大的角色。然而，國際社會卻對中國發展的可持續性及發展的方向感到不確定。在對中國感到不確定的所有原因當中，最重要的無疑是對中國共產黨感到不確定。前蘇聯和東歐的共產黨都未能抵受住當地經濟改革和政治民主化所帶來的雙重挑戰。考慮到中國的社會經濟變化在許多方面都比這些前共產黨國家

13. 譯者注：據中共中央組織部最新黨內統計數據顯示，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30 歲及以下黨員 1,369.0 萬名，佔黨員總數的 15.3%；大專及以上學歷黨員 4,103.1 萬名，佔 45.9%；女黨員 2,298.2 萬名，佔黨員總數的 25.7%。參見：《中共中央組織部：2016 年中國共產黨黨內統計公報》（2017 年 06 月 30 日），人民網：<http://cpc.people.com.cn/n1/2017/0630/c64387-29375750.html>

14. 譯者注：據中共中央組織部最新黨內統計數據顯示，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35 歲及以下黨員總計 2,272.5 萬名，佔黨員總數的 25.4%；女性黨員 2,298.2 萬名，佔黨員總數的 25.7%；大專及以上學歷黨員 4,103.1 萬名，佔黨員總數的 45.9%；參見：《中共中央組織部：2016 年中國共產黨黨內統計公報》（2017 年 06 月 30 日），人民網：<http://cpc.people.com.cn/n1/2017/0630/c64387-29375750.html>

更為劇烈，中國共產黨能夠在不斷持續的轉型中生存下來嗎？在學術界看來，這是一個合情合理的問題。中國共產黨曾經被認為是中國的先鋒隊，而現在，它逐漸減少的意識形態吸引力，即無吸引力且又笨拙的結構，以及令人大失所望的領導幹部，都使得黨的可持續性遭到質疑。中國的對外開放政策和冷戰後快速的全球化進程，都對黨的領導方式的改變產生了不斷增加的巨大壓力。黨的改革看來是最符合邏輯且必要的了。而確實，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層亦已致力採取不同方式的改革，以確保黨的統治地位。

儘管中國共產黨依然重要，但它還是讓學術界出現了形式多樣的思想困惑，學術界幾乎沒有關於中國共產黨及其未來發展的一致意見。學者們在解釋中國共產黨的發展方向和黨的本質的問題上，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其中一個極端是，樂觀主義者傾向於相信中國當下僵化的列寧主義的「黨國」模式，最終將屈從並走向不可避免的民主大道。另一個極端則是，一些悲觀主義者認為中國的轉型已經陷入困境，同時還有人預測共產主義制度將不可避免地崩潰。兩大陣營的學者似乎都有可靠的證據來支持他們的論點。結果使讀者們開始懷疑究竟哪一個陣營更加可靠，同時也增加了中國共產黨未來的不確定性。

多年來，中國的學者們一直都在關注中國共產黨的可持續性問題。自從1989年天安門事件以來，許多學者頻繁地預測中國共產主義政權會垮台。就在蘇聯和東歐共產主義崩潰之後，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聲稱，中國走上和這些政權一樣的道路只是時間問題。^[15] 1992年，鄧小平晚年的南巡講話激起了中國更為激烈的改革和更大範圍的開放，但這似乎沒有使學者們改變這一根深蒂固的成見。1994年，金駿遠（Avery Goldstein）認為：「儘管學者們對當下政權的可能壽命抱有不同的意見，但有一點是一致的，即他們所爭論的問題通常是：根本性的政治變化什麼時候會發生，以及

15. Roderick MacFarquhar, "The Anatomy of Collaps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26 (September 1991), pp. 5-9.

變化發生後會是什麼樣；而對於這種變化是否會發生，則幾乎沒有異議。」^[16]

近些年來，儘管中國經受了 30 年的改革考驗，越來越多學者依然傾向於認為，中國共產主義統治即將崩潰。2006 年，總部位於華盛頓的智庫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組織了一場辯論，議題是「重塑中國政策」。這場辯論提出了中國共產黨的可持續性問題。^[17] 在辯論中，兩位美國頂級的中國問題專家，哈佛大學馬若德和哥倫比亞大學黎安友（Andrew Nathan）都反駁了對方的觀點。馬若德認為中國共產黨將無法再維繫下去，而黎安友則持相反的觀點。^[18] 馬若德認為，「（中國的）政治體制是非常脆弱的……儘管中華人民共和國在經濟上確實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進步，但是它的政體已經陷入了系統性的危機。到北京的貴客所接觸到的，是令他們印象深刻的強大力量，但這是一個非常脆弱的體制……（在這場辯論中）我要分析一些問題，這些問題很有可能導致這個共產主義政權在幾年內就會垮台，而不是拖到幾十年後。」^[19] 其他學者似乎也與馬若德有相似的悲觀看法。例如，謝淑麗（Susan Shirk）認為「中國也許是一個新興的超級大國，但是是一個脆弱的超級大國。其中最危險的，正是中國內部的脆弱性，而不是它的經濟或者軍事力量……中國的領導人正被恐懼所困擾，他們擔心他們來日無多。」^[20]

儘管對中國共產黨的學術預測經常互相衝突，卻從來沒有人作出很大的努力去提出一種理論來解釋中國共產黨。雖然現在有關中國的發展和中國未來的文獻正在迅速增加，但在學術界，中國共產

16. Avery Goldstein, "Trends in the Study of Political Elites and Institutions in the PRC," *The China Quarterly*, 139 (September 1994), p. 727.

17. The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Reframing China Policy: The Carnegie Debates,"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5 October 2006. 參見：<http://www.carnegieendowment.org/events/index.cfm?fa=eventDetail&id=916&prog=zch>（最後瀏覽時間：2007 年 2 月 19 日）

18. Ibid.

19. Ibid.

20. Susan L. Shirk, *China: Fragile Superpower, How China's Internal Politics Could Derail Its Peaceful Ris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6-7.